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經濟學的核心

新興市場發展研究中心 吳福成 副主任

最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相繼在二十國集團〈G20〉工商高峰會和領導人高峰會提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此議題本是中國大陸「十三五」規劃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主線，旨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也要解決其國內生產過剩的問題，優化現有生產要素配置和組合，確實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以滿足需求，進而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打造新引擎、建構新支撐，故也被稱為「習近平經濟學」的核心。如今更要面向國際，接軌 G20，更突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大陸和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由於台灣對此議題仍很陌生，更遑論可能對台灣造成何種影響，也因此有加以探討之必要性。

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工商高峰會上指出，從 2016 年開始，中國正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動調節供求關係，要用 5 年的時間再壓減粗鋼產能 1 億至 1.5 億噸，用 3 到 5 年時間再退出煤炭產能 5 億噸左右、減量重組 5 億噸左右。這是中國從自身發展出發，從去產能、調節構、穩增長出發，自主採取的行動。在 G20 領導人高峰會上，習近平進一步呼籲各國應該創新發展方式，挖掘增長動能，調整政策思路，作到短期政策和中長期政策並重，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改革並重。

根據「十三五」規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當前重點是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亦即要削減製造業過剩產能〈去產能〉，消化房地產住宅存量〈去庫存〉、消除銀行和非金融企業債務及政府債務〈去槓桿〉，防止工資上漲超過勞動生產率提高、完善價格機制以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成本〉，彌補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支持企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培育發展新產業、加強農村和中西部基礎設施建設〈補短板〉。

大陸方面有人質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且與薩伊定律〈Say's Law〉強調的供給可以創造自己的需求之理論相類似。但人民日報已提出澄清和辯解，指稱兩者之間在本質上則有很大不同，西方供給學派主張刺激供給，尤其是通過減稅來刺激供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非簡單的刺激供給，它針對的課題是經濟轉型，其政策主張不只是稅收和稅率問題，而是要通過科技創新、發展實體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一系列措施來解決中國經濟供給側存在的問題。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然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後也存在著足以引起經濟變動的風險。因為

大陸的地方政府擔心稅收減少和失業增加，對國營企業結構調整、去產能和裁員持消極態度。儘管中央政府已設置 1000 億人民幣作為失業保障金，作為鋼鐵、煤炭、石油、水泥、玻璃、造船等大型國營企業裁員的「安全網」，但裁員潮已出現社會不安定因素，由於整體就業前景堪憂，對於「十三五」希望藉由個人消費支撐經濟增長，勢必面臨挑戰。尤其是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大陸各地企業債務不履行現象劇增，而經濟效益低、瀕臨破產、習慣依靠地方政府和銀行救濟來生存的「殭屍企業」，以及隨著價格變動時而停產、時而復工運轉的「海綿企業」，更對「十三五」的經濟結構改革、解決產能過剩形成不少障礙。

最後，大陸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台灣的影響有以下兩點：

一、大陸有鑒於居民境外消費或國內「海淘」形式的跨境購買金額迅猛增長，在「十三五」期間將積極要「拉回海外消費」，並推動國內產品的品質革命，以跟上消費升級的步伐。其主要做法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生產端入手，破除體制障礙，降低企業成本，推動適應新需求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此舉必將影響或弱化大陸居民來台旅遊的消費行為，以及通過跨境電商來購買台灣商品的活動，未來對台灣的經貿衝擊不可小覷。因此，兩岸有必要恢復經貿對話機制，爭取台商在大陸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可能衍生的新商機。

二、大陸的「紅色供應鏈」已對台灣的經濟貿易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並侵蝕在兩岸供應鏈上原先「非台灣不可」的優勢，今後在「十三五」期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得進一步深化，創新發展更上層樓，且不斷提升產業價值鏈，增加關鍵零組件和半成品的生產能力，使得「紅色供應鏈」對台灣的負面衝擊更趨嚴重。由於長期來台灣為因應大陸加工出口貿易形態所需，出口的商品大多數屬於中間材料和資本材料，而今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趨勢下，出口大陸若還停留在過去的模式，出口不但不會成長，還將被大陸更加火紅的紅色供應鏈所挫敗。因此，台商在「十三五」期間必須要調整兩岸供應鏈佈局，把出口主力產品轉移到消費材料，甚至朝向生活型服務業領域布局，才能創造新出路。